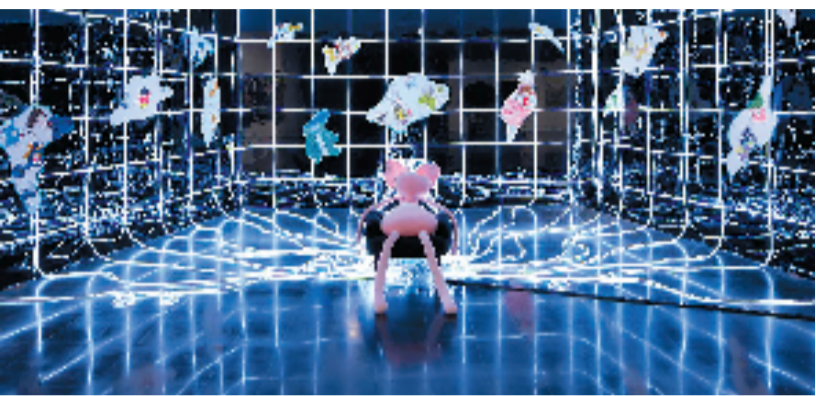


考研线越来越高 艺术生何去何从

■陈磊(西安美术学院)



2021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展现场

2022年艺术学考研国家线出来后,众生哗然。分数线比去年大幅提高了15分,以361分位列诸学科第二。连续数年飞速提升、居高不下的艺术学考研国家线,或将改变艺术学的考研格局,更会影响到艺术生的未来选择。

艺术学考研分数线过高 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造成艺术学考研国家线过高,最直接的原因是报考人数的剧增。艺术学本来是小众学科,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升格为学科门类(2011)也仅十年时间。先前艺术学的考研国家线一直相对较低,既因艺术生高考前的专业集训影响了文化课基础延续到考研中,又因偏爱自由、个性较强的艺术生较少选择读研之路。大学扩招及毕业生增多带来的就业压力、疫情持续导致的全民就业低迷与出国减少、艺术学考研低难度对其他专业的吸引,都促使报考人数的剧增,自然推动分数线的快速提升。

国家将艺术学考研线划得过高,高校在划线上的自主权越来越小,又直接导致了高校的恐慌。为了防止招生缺口以及大面积调剂带来的学校形象问题,阅卷过程中放宽标准是高校避免被动的不得已的选择。

过高的国家线将对艺术学的 考研格局产生较大影响

如果不出意外,明年艺术学的考研国家线还会再创新高。虽然其他学科也都有考研线提升的现象,但所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艺术学。这是由艺术学的特殊性决定的。艺术的特性,要求对学生思维能力的适龄开发和训练。高考前的艺术集训和统考、校考,提前锁定了专业。艺术的学习,更要求学生形象思维、感性思维、灵感思维,前期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与文理生的学习方式、高考之路有错位。

强化艺术的学习,文化课的投入时间必然减少。连年攀升的国家线,在考研这一选拔性考试中,政治、英语比重自然加大,相应的是专业课比重下降。短期来看,进入复试的研究生,到底艺术水准是否足够优秀需要再衡量。当下录取的研究生,肯定与以往的研究生不同。如何再次定义研究生

的培养,是国家和高校必须重新思考的重要问题。

当下国家政策中的中考、高考“分流”,可能会通过不断提升的国家线传递到考研中。学习不好的学生通过艺考捷径步入大学的时代,已离我们渐行渐远。考研中保送名额的增多、报考要求的增加所逐渐形成的艺术学考研高压态势,将对高端艺术人才和普通艺术人才再一次“分流”。这要求艺术学考生文化功底和艺术水准兼优,不再仅仅止步于艺术的职业化教育。

考研依然是当下艺术类 本科毕业生的最佳选择

提升学历层次的考研永远都是包括艺术类在内所有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最佳选择,正如人言“说学历没有用的人,不是真傻,就是真坏”。

从个人提升的角度来说,考取研究生,意味着接受教育年限的加长、知识储备的增加、学习能力的提升,其背后是较强的个人专注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在读研过程中,个人的提高绝非仅仅是技艺的提高,更是理论素质、艺术修养以及综合能力的提高。

从就业角度来说,硕士生相较于本科毕业生具有天然的平台优势。人严重过剩时,用人单位没有足够的时间成本考核一个人是否是人才,学历证书是判断人才与否的最为简洁的方式。通过学历证书,大致可以保证人才所具备的学习素养和学习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工作的要求。

从学科属性来说,读研之后的相对稳定的生存生活更有利于保证个人的艺术之路。艺术学是小众学科,又有着独特的“贵族”属性。个人创业和自由艺术家的选择,成材率极低,很难保证成为艺术家所必须保证的平稳创作状态。“学历型艺术人才”仍是目前社会所普遍承认的。

今天常用“内卷”一词形容竞争的激烈化,艺术学的考研竞争也在不断加剧。当众生无法“躺平”时,与其被动卷入,不如积极“内卷”。那些有理想与情怀、志向与抱负的艺术生,要对招生、考试有充分的准备,积极加入到考研的备考中。如此,自己成为分子,让众多陪考者做分母吧!

论文选录

隋唐官印初探

■丁朝阳



观

从印章发展史来看,隋唐时期完成了中国印史上又一次制度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内容是行政系统的官署公印替代先前的官职印;官员的任命凭证及等级标志不再由职官印章承担;印章使用方式以钤朱淘汰了封泥之制,由此形成了与此前秦汉印迥然不同的形制体系。

一、隋唐官印的制度变革

开黄初年,隋文帝在继承北朝制度与传统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改革,随着原本附着于官印的等级标志和授官凭证功能的分离,官印的内容渐由职官印演变为官署印。职官印的内容为官吏本身的职称,官署印的内容为官府的名号。官署印为官府所有,不属当官者本人。官吏授命时,朝廷不给印章,但到职后,接受前任移交之印。官员卸任时,转交给后任。

随之,隋唐官印形制明显变化,除帝后的御玺形制和字名另成规格外,其余官印均为鼻钮铜印,上至省、部、下至周、县、体式一致,皆自名“印”。钮式与材质的简化是适应官署体质的自然现象。

钤朱的用印方法,在隋唐普遍地使用,印泥的制作技术也已经解决。从现存敦煌文书上的大量唐代印迹来看,色泽多仍清晰可辨,可见当时油性印泥的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近世发现唐、五代官私印出土时带有印匣的已有五例。有的印匣底部还带有朱色残迹。孙慰祖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对五代“立马第四都记”印匣底部的朱迹送往鉴定,证明的确是印泥的干结物。由此可见,印匣既存放官印,又兼储印泥,唐代官印的使用方法由此可得。

隋唐朱文大印的式样基本固定,阴面均为五、六厘米左右,全用朱文,印边与印文笔画的粗细差别不大。

隋唐官印的体系一变秦汉官印的体系,改为朱文和印形增大,从根本上说,这是适应钤朱取代封泥之制的客观要求。况且由于简牍的废止,封泥已不再使用,官印钤于纸上,朱文较白文醒目,也易于施盖清晰。官印增大在纸上蘸色钤印可以更为醒目,而封泥方法的废用和官署体制的确立,使印形增大不再成为障碍。

二、印文与制作方式

隋唐官印的文字均采用小篆,但既不是秦汉印专用的缪篆,又不

是规范的秦代小篆。有人认为这种篆书是不懂篆书的印工生硬搬套的即兴发挥,但笔者认为它引入了北朝墓志篆额一路的小篆。而唐中后期的印风,趋于妥实平稳,篆法比较圆熟,力图避免前期的自然散漫之风,与当时擅长篆书的名家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李阳冰的“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以及史维则、翟令问等,皆有作品传世。

再者,有人将“之”字作为区别隋与唐官印的标志特征,这个看法,首先是由罗福颐先生提出的。但现在出土的印章显示,唐官印添加“之”的现象比较多见,他们常出现在县署印中,不加“之”的现象依然存在,故不能以此作为区分隋与唐官印的标准性特征。

隋唐官印的制作方式,有直接铸文,有二次铸造(焊铸)和凿刻。直接铸文和焊铸的印文,过去常被混为一谈,认为隋唐官印皆属“蟠条印”。笔者认为,从隋唐官印的印迹来看,绝大部分隋唐官印属于直接铸造。由于“蟠条印”的工艺有所局限,遇到繁密的印文难以普遍使用,甚至在运用过程中脱落笔画。凿刻的工艺,也比较少见,如“平琴州之印”。

官印的背款,也是隋唐印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现在确定为隋官印的四方印,皆刻有年款。而唐官印,除了少数几例刻有释文字款外,大多未再延续刻款的做法。有人怀疑隋代的年款为伪刻,罗福颐先生先前认为:“其说容或可信”,之后又明确指出:“均是古董商人所伪刻”。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制作风气的转变,隋唐官印在背款上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但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唐印中,又有许多的陶瓦印,这些陶瓦官印也有中央、地方两类。与铜印风格基本相同,可以看出其中有的陶印并非地方自制。过去认为唐代没有殉官印的制度和习俗,但这几方印皆为陶质,其用途显然不可能是实用之印,应是殉葬专用印。

从篆刻艺术的角度看待隋唐官印,一方面应该看到秦汉古印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已基本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应该看到,隋唐官印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对后世印章所产生的影响。